

城市老年人数字融入中的代际支持机制与家庭权力重构

刘起瑜

贵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1日

摘要

数字技术已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 但老年群体在数字接入、技能与应用层面普遍面临困境。既有研究多从个体素养视角解释老年数字鸿沟, 忽视了数字使用是嵌入在家庭代际互动中的社会过程。本研究超越个体素养的单一视角, 基于17组城市社区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配对访谈和现场观察, 采用扎根理论与类型分析方法, 系统考察代际数字支持的形成机制、实践模式及其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 老年人优先向子女求助的行为, 由技术迭代所导致的“持续性去熟练化”、数字风险下的家庭信任转移以及孝道伦理共同推动; 代际数字支持可归纳为操作替代、技术教学、远程协助和完全托管四种模式, 这四种模式构成了从操作执行权到数字身份控制权逐层让渡的权力谱系。代际数字支持虽有助于弥合功能性数字鸿沟, 却也导致家庭权威的重新配置、老年人数字依附内化与数字照料劳动的性别化, 并重塑了家庭代际关系。在此基础上, 研究提出“数字治理的家庭化”与“被代理的参与”两个核心概念, 用以揭示数字适应成本向家庭转移的结构逻辑, 并反思当前数字包容政策重形式而轻自主的局限, 既为数字反哺理论引入权力分析的路径, 也为积极老龄化政策提供家庭视角的批判性反思。

关键词

数字反哺, 数字鸿沟, 代际支持, 家庭权力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Mechanisms and Family Power Reconfiguration in the Digital Inclusion of Urban Older Adults

Qiyu Liu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26,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0,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1, 2026

文章引用: 刘起瑜. 城市老年人数字融入中的代际支持机制与家庭权力重构[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9): 352-359.
DOI: 10.12677/ar.2026.139666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the infrastructure of social operation, yet older adults generally face difficulties in digital access, skills, and usage.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explain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older adults from an individual literacy perspective, overlooking that digital use is a social process embedded in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s. Transcending the singular lens of individual literacy, this study draws on paired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with 17 older adul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in urban communities, and employs grounded theory and typological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practice patterns, and impact on family power rel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suppor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lder adults' preference for seeking help from their children is jointly driven by persistent deskilling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the transfer of familial trust under digital risks, and the ethics of filial piety. Intergenerational digital support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modes, namely, operation substitution, technical instruction, remote assistance, and full proxy, which constitute a power spectrum where operational execution rights are progressively ceded to digital identity control. While such support helps bridge the functional digital divide, it also reconfigures family authority, internalizes digital dependency among older adults, and genders digital care labor, thereby reshap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uilding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two core concepts, domestica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participation by proxy, to uncover the structural logic of shifting digital adaptation costs onto families and to critique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digital inclusion policies that prioritize form over autonomy. This approach introduces a power analysis perspective into digital reverse mentoring theory and offers a critical reflection from a family perspective for active aging policies.

Keywords

Digital Reverse Mentoring, Digital Divid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amily Pow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社会运行，成为获取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然而，老年群体在数字接入、技能与应用层面普遍面临困境。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 6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已达 1.61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52% [1]，但仍有大量老年人无法独立完成线上挂号、移动支付等高频操作。如何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包容，已成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议题。

既有研究多从个体素养视角解释老年数字困境，强调年龄、教育程度、认知能力等个体因素 [2] [3]。据此提出的政策干预以数字技能培训、界面适老化改造为主 [4]。然而，这些措施未能充分解释为何大量拥有智能手机、具备基本认知能力的老年人依然难以独立使用数字服务。事实上，老年数字融入不仅是技术学习问题，更是一个嵌入家庭代际互动的社会过程。

近年来，“数字反哺”现象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子女向父母传递数字知识的过程 [5]。但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性层面，强调反哺的积极功能，较少深入分析代际数字支持的互动逻辑、权力动态及其对家庭关系的重塑后果。尤其值得追问的是：当老年人高度依赖子女完成数字操作时，这种“支持”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数字融入？又是否同时生产了新的依附与不平等？

本研究超越个体素养的单一视角，在代际关系视域下分析老年数字融入。基于 17 组城市社区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配对访谈与现场观察，本研究旨在解构代际数字支持的互动逻辑与实践形态，揭示家庭关系的运作机制与权力动态。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回答：代际数字支持如何形成与维系？家庭数字帮扶存在哪些实践模式？数字支持又如何重构家庭权力关系与情感秩序？

2. 文献综述

2.1. 老年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研究经历了从“接入鸿沟”到“技能鸿沟”再到“使用收益鸿沟”的三阶段演变。早期研究关注物理接入的不平等[6]；随后学者指出，即便拥有设备，不同群体在数字技能上仍存在显著差异[7]。近年来，研究进一步聚焦“第三级数字鸿沟”，即数字技术使用所带来的实际收益差异[8]。

老年群体在上述各层级均处于劣势。年龄与认知老化、教育程度偏低、技术焦虑等变量被反复证明是老年数字鸿沟的主要预测因素[9]。国内研究也发现，老年人的数字技能主要受个体特征影响[10]。据此提出的政策干预以个体赋能为核心，如开设社区培训班、设计适老化界面等[11]。

然而，个体素养视角存在明显局限。它倾向于将老年人视为孤立的技能学习者，忽略了数字使用深深嵌入家庭与社会关系网络这一事实。老年人并非在真空中使用技术，其操作行为、求助对象与学习方式均受家庭互动模式形塑。单纯提升个体素养，难以解释为何同一老年人与不同子女互动时会呈现出数字能力的显著差异。

2.2. 代际关系与数字反哺

人类学家 Mead 提出的“文化反哺”概念，指涉快速社会变迁中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反向传递知识、价值观与技能的过程[12]。周晓虹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语境后，以“数字反哺”特指子女帮助父母使用数字技术这一现象[13]。后续实证研究围绕数字反哺的频率、内容与影响因素展开了描述。

家庭代际支持理论为理解数字反哺提供了重要框架。交换理论认为，代际支持基于互惠逻辑，子女为父母提供数字帮助以回报早年的养育投入[13]。孝道伦理则侧重责任规范，将成年子女照料父母日常生活(包括数字事务)界定为应尽义务。国内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绝大多数子女将帮助父母使用手机视为分内之责[14]。与此同时，数字反哺过程伴随着家庭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动态转移，子代技术能力优势逐步转化为新型家庭权威资源[15]。

既有研究确认了数字反哺的普遍性与积极功能，但其局限同样明显。其一，相关研究多将数字反哺预设为单向、正面的知识传递，相对忽略了帮扶过程中夹杂的摩擦、倦怠与权力博弈；其二，对帮扶模式缺乏细致的类型化分析，未能揭示不同介入程度背后隐含的权力差异。这构成了本研究的出发点。

2.3. 本研究的切入点

综合上述两个脉络的文献，本研究将老年数字融入置于代际关系视域中，超越个体素养的单一视角，通过配对访谈与观察，系统分析代际数字支持的形成机制、实践模式及其家庭权力后果。研究旨在考察代际数字支持如何形成、存在哪些实践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如何重构家庭权力关系与情感秩序。研究期望为数字反哺理论拓展权力分析的路径，同时为数字包容政策引入家庭视角的批判性反思，进而揭示“数字治理的家庭化”这一结构逻辑。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突破将老年人数字困境归因于个体素养的单一视角，在代际关系视域下分析其数字融入，旨

在基于质性资料解构代际数字支持的互动逻辑与实践形态，揭示家庭关系机理与权力动态。本章从研究方法、资料来源、研究对象与样本、资料分析策略三方面说明研究架构。

3.1.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以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与代际配对访谈为主，辅以现场互动观察，以实现多源资料的相互印证和情境信息的补充。

半结构化访谈是获取代际数字支持主观经验的核心方法。老年受访者访谈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智能手机初次使用时间、日常使用场景与频率；求助对象的选择及其动因；向子女求助的具体过程(以近期真实事件为切入点)；接受帮扶时的心理感受(如社交尴尬、人情负担、学习挫败感)；以及对数字化便利性与独立性的评价。子女受访者访谈则聚焦于：帮扶频率、场景与内容；帮扶过程中的耐心消耗与照料疲惫感；对父母学习能力的评价及归因；以及将数字帮扶视为家庭责任还是生活负担。访谈以面对面形式为主，对跨省居住者辅以电话或视频，单次时长约 30 分钟。

本研究在方法上的一项创新是采用代际配对访谈，即分别对同一家庭中的老年人和子女进行独立访谈，以获取双主体视角。其分析价值在于：双方对同一互动过程存在认知偏差，老年人更易感知到人格尊严层面的冲击，而子女更多体会到照料倦怠；这种叙事差异本身就是家庭权力动态的一种表征，仅凭单方访谈难以捕捉。研究以配对样本为主体，单方访谈的比例控制在总样本量的三分之一以内。

在获得知情同意后，研究者对子女指导老人使用手机的真实场景进行现场观察(每次 10~15 分钟)，不干预互动过程，记录语气、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语言行为，以期为后续的访谈解读提供情境支撑。

3.2. 研究对象与样本情况

研究对象为城市社区 60 岁及以上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及其提供过数字帮扶的成年子女。限定城市社区以统一数字服务情境基底，剥离城乡基础设施差异。最终选取 17 组老年 - 子女配对样本，依据信息饱和和原则确定。采用目的性最大变异抽样，从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亲属关系、居住安排五维度拉大异质性。受访者基本特征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basic respondent characteristics (N = 17 dyads)
表 1. 受访者基本特征分布(N = 17 组)

特征维度	类别	人数
老人年龄	60~69 岁	5
	70~79 岁	7
	80 岁及以上	5
老人性别	男	6
	女	11
老人教育程度	文盲/小学	5
	初中/高中/中专	8
	大专及以上	4

续表

老人月收入	1000 元以下	2
	1000~3000 元	7
	3000~6000 元	6
	6000 元以上	2
亲属关系	父女	4
	父子	2
	母女	7
	母子	4
居住安排	同住	4
	同城近居	9
	跨省远距	4

样本结构为后续比较分析构建关键维度：居住距离(同住、同城近居、跨省远距)决定支持物理可及性，是解释模式差异的首要结构变量；教育程度与支持方式对应，低学历者更接受操作替代，高学历者倾向系统教学；亲属关系为分析数字照料性别分工提供基础；月收入跨度大，预留阶层分化分析空间。

3.3. 资料分析策略

访谈全程录音并逐字转录，对受访者匿名编码(老人 A，子女 B)。采用扎根理论三级编码与类型分析方法：开放式编码提炼初始概念，主轴编码归纳核心范畴，选择性编码串联形成机制、帮扶模式与权力重构三条主线。在此基础上，依据代际支持的介入程度与老年人的数字自主程度，建构出操作替代、技术教学、远程协助与完全托管四种模式，构成从操作执行权到数字身份控制权逐层让渡的权力谱系。跨案例比较着重考察代际叙事落差，以此揭示家庭权力动态。

4. 研究发现

本章以 17 组城市社区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配对访谈资料为实证基础，遵循代际数字支持形成机制、实践模式及家庭关系后果的递进逻辑，逐层展开分析与阐释。

4.1. 代际数字支持的形成机制

老年人在遭遇数字困境时，普遍优先向成年子女求助。这一现象由技术门槛、社会信任结构与家庭责任伦理共同推动。

从技术门槛看，数字技术迭代导致老年人持续陷入“去熟练化”困境。数字能力并非一次性习得，而会因平台更新、界面变化不断失效。受访者 A14 提到：“上次我女儿教我挂号，我记在本子上，结果一个月后 APP 变了样子，本子全没用了。”老年人习惯依赖固定步骤记忆，而年轻子女更多依靠技术直觉与探索式操作。B13 表示：“我们用手机靠感觉，哪里不对退回来再试，但我爸需要固定路径，界面稍微变一下就不会了。”

从信任结构看，数字空间中的风险感知推动风险向家庭内部转移。由于养老金、金融账户与数字服

务深度绑定，老年人对诈骗、误操作和隐私泄露高度警惕，不愿将手机和账户交给外人处理。A12 表示：“别人我不敢让碰手机，只有我女儿不会害我。”因此，子女不仅承担技术指导角色，也成为数字风险的责任担保者。B01 说：“我妈微信绑着退休金卡，她不敢乱点，真出事最后还是得我负责。”代际数字支持已超越单纯技术传递，演变为家庭内部的风险分担机制。

从责任伦理看，数字帮扶是传统孝道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子女普遍将帮助父母使用数字技术视为家庭责任，即便产生疲惫与烦躁，也会基于代际回馈伦理继续承担帮扶。B07 表示：“他们以前也一遍遍教你用筷子，其实一个道理。”但老年人求助源于被动困境，子女帮扶则出于道德责任，双方动机存在差异，这为情感摩擦埋下基础。

4.2. 代际数字支持的四种介入模式

依据帮扶介入强度与老年人自主程度，家庭数字帮扶可划分为四种模式。

操作替代型模式(共 7 组)占比最高。子女不进行教学，而是直接代替老年人完成全部操作，效率虽高但老年人自主性极低。该模式的形成源于双方对效率的共同追求：子女认为反复教学的成本过高，老年人则因容易遗忘和担心添麻烦而主动放弃学习。B10 说：“教十遍不如我三十秒弄完。”A03 也表示：“学了也忘，还惹人烦。”长期来看，这一模式会强化“越不会越不敢尝试”的循环。

技术教学型模式(共 4 组)中，子女通过分步骤讲解与实操练习帮助父母学习。这种模式通常要求老年人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较强的学习意愿，且子女对其学习能力持积极评价。A15 表示：“学会了自己方便，也不用看人脸色。”但即使在教学模式下，教学节奏与内容仍由子女主导，代际权力依附依然存在。

远程协助型模式(共 3 组)多见于跨省分居家庭。子女通过电话或视频远程指导，但语音指令往往较为抽象，与老年人依赖具体步骤的认知习惯构成冲突，容易引发情绪摩擦。A17 说：“他说太快我跟不上，两个人都着急。”虽然操作由老年人亲自完成，但决策与路径仍依附于子女指令，属于遥控式依附。

完全托管型模式(共 3 组)多见于高龄、低学历家庭。子女全面掌管老年人的账号、银行卡与社保密码，实际接管其数字身份。A08 表示：“银行卡、社保卡密码都在儿子那里。”这种高度信任的背后，也意味着老年人数字主体身份的实质性退出。

数字支持模式并非由老年人个人意愿单独决定，而是受到居住距离、教育水平与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上述四种模式依次体现为操作执行权、行为决策权与数字身份控制权的逐层让渡，成为家庭权力重构的重要载体。

4.3. 家庭权力关系的三重重构

代际数字支持在弥合功能性数字鸿沟的同时，也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行为模式与情感秩序，集中体现为家庭权力格局的重新配置、老年人数字依附的内化以及数字照料劳动的性别化。

传统家庭权威建立在年龄、阅历与孝道伦理之上，而数字技术的介入使技术能力成为一种新的权威资源。子女因掌握数字技能而在挂号、缴费等日常事务中拥有更多话语权(B13：“以前家里什么事都我爹说了算，现在手机上的事他得听我的。”)。然而，仅凭技术依赖推导“权威逆转”是片面的。经济自主权与伦理地位起到了重要的缓冲或抵抗作用：退休金较高、拥有独立房产的老年人更倾向选择“教学型”帮扶，且较少感到权威下降(A15：“经济上我不靠他们，说话就有底气。”)；反之，经济上依赖子女的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完全托管并主动让渡决策权。同时，孝道伦理限制了技术权威的溢出范围——子女在购房、医疗等重大家庭决策中仍尊重父母意见(B06：“教手机可以急一点，但家里大事肯定要听她的。”)。因此，更准确的判断是：数字支持带来了家庭权威的局部重组，技术性事务的决策权向子女倾

斜，而传统伦理与财产性事务的权威仍部分保留在老年人手中。

无论经济条件如何，高频的数字求助都会催生心理层面的依附。A14 表示：“现在离了我女儿，我连医院都去不了。”长期依赖与风险规避使外部依附逐渐内化为“我确实不行”的身份认知。操作替代型模式下依附最深，完全托管型近乎丧失数字主体性，远程协助型则处于“操作参与但决策依赖”的矛盾状态。经济自主能力较强的老年人虽依附程度略轻，但仍难以完全摆脱技术依赖的独立心理机制。

代际数字支持还凸显了数字照料劳动的显性化与性别化。数字帮扶是一种持续性、突发性且缺乏边界的照料劳动，伴随时间精力消耗与情感压抑(B11：“教了一个小时还是不会，我想发火又得忍住。”)。样本中 11 位女儿里有 9 位成为主要求助对象，其情绪压力明显高于儿子群体。这表明，数字照料劳动已成为传统性别分工在数字时代的延伸，且这一分工相对独立于经济贡献与家庭话语权。

代际数字反哺既维系亲情也构成隐性负担，推动家庭权力在技术、经济与伦理多个维度上重新配置。仅用“权威逆转”概括这一过程是片面的，更合适的理解是：数字支持在家庭中创造了一个“技术权威”的新兴场域，其权力分布由技术能力、经济资源与伦理地位共同决定，并与其他家庭事务决策场域保持张力。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城市社区 17 组老年人与成年子女配对访谈，考察老年数字融入中的代际支持机制及其家庭关系后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5.1. 数字治理的家庭化与“被代理的参与”：技术风险与数字包容的限度

公共服务数字化旨在提升治理效率，但老年人能否享受数字化红利，取决于能否获得长期技术支持与风险兜底。社区机构与市场服务尚未有效承担这一功能，成年子女已成为老年数字生活最主要的支撑力量。无论操作替代、全程托管，还是分步教学、远程指导，家庭都在被动承接本应由公共服务体系承担的数字适应成本，并形成长期性制度依赖。当前数字系统以年轻人认知逻辑与操作习惯为预设，持续更新与界面迭代使老年人反复“去熟练化”，家庭数字照料由此成为没有终点的长期劳动，女性子女尤其长期处于技术待命状态，实质充当数字公共服务体系末端的无偿照料者。据此，研究提出“数字治理的家庭化”，指数字治理体系在追求效率过程中将技术适应成本与数字风险从公共领域转移至家庭，使家庭成为维系数字社会运行的隐性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现有老龄政策多将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视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但研究发现，大量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并非建立在自主能力上，而是依赖子女代操作、代决策与代管理，可概括为“被代理的参与”。它指老年人虽完成线上挂号、移动支付等数字行为并享受便利，但其实现过程依赖子女的技术劳动与风险承担。操作替代型下，老年人基本退出数字操作；完全托管型下，进一步让渡个人数字身份与账户控制权。数字便利由老年人享有，学习、适配与风险成本主要由成年子女承担。这挑战了数字包容的内涵：当数字参与高度依赖家庭代理时，形式“接入”是否等于实质数字融入？因此，数字包容评估不能只看是否联网、是否使用智能设备，还应区分自主参与与代理参与、能力习得与权力让渡。否则，政策可能止步于表层化成果。

5.2. 积极老龄化的张力：赋能何以同时生产依附

研究揭示了积极老龄化在数字场域的内在张力：数字赋能与数字依附相伴而生。数字技术改善老年人就医、社交与信息获取的同时，也强化其数字依附：越依赖子女帮扶，自主实践机会越少；实践不足又削弱数字能力，形成“赋能强化依附、依附固化能力弱化”的循环。其根源并非老年人学习能力不足，

而是数字技术设计逻辑与老年人认知方式的结构性错位——平台以年轻用户探索式操作为标准，忽视老年人固定步骤记忆习惯；子女帮扶又常效率优先，以直接代劳替代系统教学，进一步固化能力滞后。积极老龄化所强调的数字赋能，在家庭实践中易被简化为“代为办事”。

5.3. 研究贡献、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数字反哺从经验现象拓展为分析家庭权力变动的理论工具；提出“数字治理的家庭化”与“被代理的参与”两个概念，揭示数字适应成本转移的结构逻辑并反思政策的形式化倾向。研究局限包括：样本仅限城市社区，未覆盖农村及无子女独居老人；部分跨省案例仅依赖单方叙述。未来研究可开展城乡比较，探索社区与市场服务替代家庭数字照料的路径，并通过量化研究考察数字照料劳动的阶层与性别分布差异。

参考文献

- [1] 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721/c88-11328.html>, 2026-06-15.
- [2] 闫泽煜, 朱逸飞, 潘天一, 等.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齐齐哈尔市老年人数字素养影响因素及社会融入数字化场景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25, 41(2): 165-169.
- [3] Hargittai, E. and Dobransky, K. (2017) Old Dogs, New Clicks: Digital Inequality in Skills and Uses among Older Adult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 195-212. <https://doi.org/10.22230/cjc.2017v42n2a3176>
- [4] 胡淳棋, 王悦, 何琪琪, 等. 银发数字鸿沟弥合的核心驱动要素的调查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8): 93-103.
- [5] 陈则谦, 任婧媛. 代际数字鸿沟的弥合之径: 数字反哺的一项系统性综述[J]. 图书情报工作, 2025, 69(1): 135-148.
- [6] Mcconnaughey, J., Everette, D., Reynolds, T., et al. (1999)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 MIT Press.
- [7] Hargittai, E. (2010) Digital Na(t)ives? Variation in Internet Skills and Uses among Members of the “Net Gener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80, 92-113. <https://doi.org/10.1111/j.1475-682x.2009.00317.x>
- [8] Ragnedda, M. (2017) *The Third Digital Divide: A Weberian Approach to Digital Inequalities*.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606002>
- [9] Panetta, I.C., Anjomrouz, E., Paiardini, P. and Leo, S. (2025) Digital by Default? A Critical Review of Age-Driven Inequalities in Payment Innovation.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18, Article No. 313. <https://doi.org/10.3390/jrfm18060313>
- [10] 赵晓航, 李建新. 老年人数字行为的变迁机制与分化逻辑[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2(5): 55-66.
- [11] 司莉, 刘晋宁, 蒋冰, 等. 我国城市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障碍识别与解决路径[J]. 图书馆建设, 2025(6): 25-32.
- [12] Mead, M. (1970)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Leonardo*, 6, 411-413.
- [13] 周裕琼, 丁海琼. 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3): 6-31.
- [14] 于潇, 刘澍. 老年人数字鸿沟与家庭支持——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61(6): 67-82.
- [15] 丁汉青; 杜洁. 权力的转移: 智能手机使用中“文化反哺”的场域效应[J]. 新闻春秋, 2023(4): 26-35.